



薛暮桥 著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1956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广东经济出版社

薛暮桥 著

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SX02/03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9
ISBN 7-80632-281-7

I. 中…
II. 薛…
III. 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0.2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薛暮桥 著

出版发行：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 销：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乡）
规 格：889×1194 毫米 1/32 10.75 印张 2 插页 254 000 字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7 月第 2 次
印 数：5 001~9 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80632-281-7 / F · 128
定 价：2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 ●

编辑（论证）委员会

主任：刘国光

副主任：张卓元 李本鈞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厉以宁 丘克军 刘国光 刘诗白
张卓元 谷书堂 何炼成 李本鈞 李京文
李晓西 李翀 吴至强 吴敬琏 陈东琪
陈吉元 陈佳贵 杨圣明 钟阳胜 袁恩桢
黄达 黄范章 黄德鸿 樊纲 魏杰

出版说明

在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我们满怀喜悦与感慨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丛书。

追寻新中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脚步，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闪光的足迹，无不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紧密相连；每一段坎坷之路，同样，也都与理论的灰暗、理论的实践程度不足连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深感，对中国经济学家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已经取得的一大批重要理论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初步追寻与回顾，遴选出曾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今后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经济学著作，编成丛书予以出版；这对于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其意义均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发起开展“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并出版此丛书的缘由。

为了将这件意义深远的工作做好，我们成立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工作小

组，成立了以刘国光（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为主主任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李本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的论证委员会，组织了全国 25 名知名学者、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千计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科学、认真的论证，经过反复的遴选，最后在京召开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郑重推荐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新人口论》等 10 本优秀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代表了新中国各个阶段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曾深深影响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其中薛暮桥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曾三次重版六次印刷，发行量达 1000 万册，可见该书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其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显然毋庸置疑。

我们认为，此次具有一定权威性、客观性、科学性的论证活动所隆重推出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丛书，对于理论部门研究中国经济建设史、研究中国经济学说史；对于经济实践部门掌握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科学决策；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提高经济学素养，均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总序

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荐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较大影响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这一活动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新中国近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并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艰巨的。在成千上万本著作中，推荐 10 本书，不能不说这是挂一漏万的选择。所以，这次推荐论证活动，只能叫做第一次，以后还应有第二次、第三次，逐步把多数好的经济学著作都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第一次”的推荐论证活动，是由在京的许多专家反复商量，先后提出了 83 本和 52 本备选书目；并由全国 25 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论证评选委员会，通过认真讨论，最后投票选出了以下 10 本经济学著作：

1.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2. 马寅初：《新人口论》；
3.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4. 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5.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又名《中国半封建半

殖民地经济研究》);

6.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7. 蒋一苇:《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8.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9.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10. 吴敬琏 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这 10 本著作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以及在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然，有的著作是 80 年代以前写的，所讲的内容，似乎离我们当前体制改革的话题较远。但我们可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中国近 50 年的历史，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今天的经济理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类著作虽然已不完全是今天的话题，确也不可否认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的积极作用。同时，当人们仔细阅读这些著作以后，也会体会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潮流来之不易，我们更应珍惜她，发展她。

另外，由于经济理论的繁荣，好的经济学著作也数不胜数。这里所推荐的 10 本著作，她们的长处、短处，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也希望广大读者进行评议。

刘国光

1998 年 8 月

修 订 版 序 言

薛暮桥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 1980 年出版问世之后，初版仅 5 万本。但它很快成为我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仅人民出版社就增印到接近 300 万本。许多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科书，因供应不及，许多省就由人民出版社供给纸型翻印，各省印数已达 650 多万册。在国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有英、日、法、西班牙文版，供不应求，有些国家就自己翻印。西德和南斯拉夫，把这本书自己译成德文和塞尔维亚文。这本书引起国内外如此注意，足见其价值。

今天，薛暮桥同志光临我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就是他最近已经写好这本书的修订本。他对我说，在修改的时候，他检查了原书，认为当时所提的各种原则，今天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成绩巨大，而且经济工作在理论上也有很多发展，必须编入书中，因此，修改和补充的约占篇幅的 1/3。

因为我曾向读者介绍过第一版，他要我为修订版作一短序。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全国来说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在经济理论方面照抄别国是要吃苦头的，这种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也不能用政治来代替经济，“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苦头还吃得少么？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自己的国情，并由此出发，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这个过程现在还远远没有完结，但是已经有了个很好的开头。理论要从实际中实事求是地抽象出来，并且再要用到实际里去，证明它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要改正，如果还有不足之处，就要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增加不足的。如此周而复始，实践——理论——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现真理、完善真理的过程。

我们能够掌握真理么？民主革命的过程证明真理是能够掌握的。

1927年，国民党变为反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由城市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那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不起我们。党内有王明一派，引经据典，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落后的，是动摇的，是跟资产阶级走的，发展农民入党使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政党，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军队只能是土匪、流寇，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王明一派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依照他们的主张，就应该攻打大城市，到那里的工人中间去发展党员，组织红军。这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统治党四年之久，迫使红军打败仗，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革命几乎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而是相信中国农民，知道中国农民同西欧农民有不同特点，拒绝以马恩对西欧农民的估计作为教条。毛泽东同志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建立了中国革命新的政治理论和战争理论，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战争22年，终于使中国的革命得到了震惊世界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

修订版序言

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

薛暮桥同志的书，其意义、其重要性就在这里。我祝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修订本的出版，并且希望全党、全国经济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都来仔细研究这本书。目的只有一个，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富强起来，使四个现代化实现。这本书也可供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参考，他们要依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经济建设，求得脱离贫困，兴旺发达。

连夜写了这篇短序，表示我的喜悦。

陆定一

1983年2月25日午夜

修 订 版 前 言

本书从初版付印，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个期间，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方针，经过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很快，新情况、新问题、新观点、新政策不断涌现，本书有许多论点已经落到实际经济生活的后面了。1980年夏天，曾打算进行修改，鉴于本书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定稿，基本方向还是正确的；有些具体情况虽然已有发展，但还正在继续发展，所以决定暂时不改。1981年夏，又考虑修改，根据同样的理由再一次放下了。当时根据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只写了一篇《跋》，指出本书的某些缺点，供读者参考。去年，我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胡耀邦同志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接着，又开了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会上赵紫阳同志作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又有许多新的发展。为了使本书能更好地反映最近三年多来的新情况，体现党的十二大的精神，这次集中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修订。经过这次修订，我自己认为比较大的缺点已经消除了。未修改的部分，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三年多以来的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观点、新政策也尽可能做到在书里有所反映。但是，因为时间短促，总会有疏忽之处，何况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新情况、新问题仍会继续出现，修订以后，也难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由于本书不是一本阐述基本理论的著作，而是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的缺点更是无法避免的。只要做到基本观点大体正确，我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现在，我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但是，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仍然很多，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这个成果还比较脆弱，必须再用一段时间来巩固它，使它进一步完善；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然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但还缺乏周密的整体规划，尚待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仍然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把这本书改得尽善尽美，也是不实际的。同时，此书篇幅不大，也不可能照顾到各方面，把所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观点、新政策都吸收进来。所以，在把这本书作为教材的时候，老师们应当认真研究党和政府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文件，并阅读全国经济学家的重要论著，不要局限于读这本书。作者在本书初版以后出版过两本论文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在内容上有一些与本书有关，也可以作为参考。

与初版比较，修订版篇幅稍有增加。在新增部分和原版之间，甚至各章节新增部分之间稍有重复，因受时间限制未能仔细调整。为着争取早日付印，只能让这缺点留了下来。

陆定一同志听到我在修改这本书，特地写信来鼓励我。这本书最初是在定一同志任中央宣传部长时由他提出要我写的，此书出版后他亲自审阅，并且给以鼓励和推荐，对于此次修改，他又

修订版前言

如此关心，所以我请求他为本书写篇序言。他不但慨然应允，而且在一夜之间就写成了。对于定一同志的关怀，我在此表示十分感谢！对他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将继续研究，决不辜负他的期望。

此次修订，是在苏星、吴凯泰、何建章三位同志协助下进行的。这本书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我个人的专著了。本书初版发行后，三年来曾收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由于精力有限，难于一一答复，十分抱歉。这次修订时，考虑和吸收了读者来信中提出的意见。在这里对提出意见的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1983年3月

再 版 说 明

“文化大革命”前，陆定一同志（当时的中宣部长）给我和孙冶方、于光远三人分配了任务，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时我欣然接受。但当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难抽出时间有系统地研究和撰写。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被批判、审查，干扰我的思想，折磨我的肉体，但我总想很好地完成中宣部给的任务。不论如何困难，也要把书写出来。在“牛棚”里学了《毛泽东选集》，写了第一、第二稿。在五七干校及 1973～1975 年在北京，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写了第三、四、五、六稿。但是有两个问题自己总是未能突破。一是指导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对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一稿的书名就是《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也摆脱不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某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很难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二是原想写一本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来写去，困难很多。由于这样，写出来的稿子，同“文化大革命”前的文章比较，进步不多。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徘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实行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又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时，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使我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敢于打破“禁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我力求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国情出发，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当时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的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长，经验不成熟，当前很难写成一本完整的系统的教科书。我只想把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经济工作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供后人参考。两个自己几年来难于突破的问题，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解决了。我在几位同志热情、积极的帮助下，写成了第七稿，这就是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以后随着形势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又加修改，1982年3月出版了修订本。

2 1977年上半年，当时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党校校长。我去见他，要求借几间房间，让我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三位同志（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员）住在党校合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耀邦同志很支持，我们在党校住了3个月，共同讨论，分工写作，批判的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这一稿援引经典著作较多，在理论上有所提高，但是所有经典著作都不能直接提供解决我国经济现存问题的答案。要解决我国经济现存的问题，必须到基层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写这本书的愿望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再次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我写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热情。我们仅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七稿。这期间经过元旦和春节，我们连过年过节也全都忘掉了。

我在这本书中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是下列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历史经验证明，客观规律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当你的行动符合它的时候，它似乎并不存在，而当你违反它的时候，它就使你受到惩罚。总结成功的经验固然能教育我们认识规律，总结失败的教训更能教育我们。人们是在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中取得实践经验，从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过去 20 多年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很不完全、很不深刻，屡次受到惩罚。今天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提高认识，并且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使之不断进步。我在此书的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写书的目的，是要“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全书的结束语，我用的标题是“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我想系统论证：过去 20 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挫折，是因为我们从“左”的方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左”倾错误。

第一，我批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在第一章中，我首次公开论述 1959 年海南岛读书会上所讨论的观点，认为现在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否也需要分几个阶段？”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存在一个低级阶段，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我在这里所说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并没有达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的水平，只是初步探索。那时主要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除全民所有制外，还广泛存在集体所有制，而且今后集体所有制应当有发展；当时还没有提高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条件下多种